镇原群众支前忙

张自强

镇原县位于甘肃省东部，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镇原，播下了革命火种，党的组织随之在此成立；抗战期间，镇原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中，镇原人民听从党的号召，顾全大局，克服重重困难，自觉投身于拥军支前运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坚决支援解放战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著贡献。

支前群众为解放军指战员送军鞋

踊跃参军，为部队输送兵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镇原群众很快掀起了参军热潮，为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镇原群众参军人数为212名；1946年参加正规军人数为509名，参加地方武装和民兵人数为293名；1948年，10名干部随军出征；1949年，参加解放军正规部队人数为760名，参加地方武装和民兵人数为516名。解放战争开始后，镇原解放区群众就出现了参军参战热潮，参军光荣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和动人事迹，当时，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上前方的事例不胜枚举。1946年，仅孟坝、柳洲、三岔3个区，父母送子参军的事例11起，弟兄相争参军的2起，妻送夫的1起。孟坝区在两天内就有50多人报名。据1947年10月28日《边区群众报》记载：8月20日镇原县群众大会上，就有20名青年现场报名参加解放军，三岔的一名17岁青年在大会上报名，并道出了群众的心声。他说：国民党统治三岔时，他家里年年不够吃穿；自从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后，他家再也“没出过负担”，如今刚要过“好光景”，国民党反动派就来了，所以他一定要参军，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保卫“好光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时时都有青年骑马挂红奔赴前线，拥军歌声、口号声全县随处可闻。全县干部群众认真抓好拥军优属工作，凡烈军属家中生产，由农会组织群众代行。同时，干部群众承担起为烈军属修房屋、送柴草等任务，随时为烈军属解决各种问题。镇原青年参军后，作战勇敢，其中有不少人立功受奖，为家乡人民争了光。

做军鞋、交公粮，确保前线军需

解放战争期间，县里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广泛发动群众支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县委、县政府各级部门利用各种节日、纪念日加强宣传，对全县广大妇女进行教育，鼓励广大妇女进行反封建斗争，在号召妇女参政、参加生产的同时，号召妇女为支前作出贡献。

做军鞋、担架运输是支前工作中一项大量的、经常性的重要任务。解放军的鞋袜，消耗量大，全靠发动老百姓制作，保障供给。当时做军鞋的办法是，由县政府下达任务，按任务发给相应的布匹作为材料和手工费。由于政府财政和物资困难，材料往往发不到或不能按时发到群众手中，老区的广大妇女不计较报酬，农忙时白天干活，夜晚挑灯赶做，农闲或天阴下雨则日夜赶做，全县老区当时4.49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妇女做军鞋就14994双，另有服装、被褥等无算。

解放战争期间，镇原县人民踊跃缴纳公粮，并积极为解放军部队筹集、转运粮草和各类军需物资，全力保障前线的后勤供给。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镇原县老区交公粮2766石(每石450斤)，饲料166480斤，“草代金”49.94万元；1946年，交公粮5000石，其中米700石，小麦3200石，饲料1100石；1947年，交纳公粮(细粮)6800石，“每斤粮带草17斤”；1948年交公粮10500石，饲料105万斤；1949年，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收复，夏秋两季筹集粮食57900石、饲料11109石。

镇原县群众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动员一切力量，多次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运输任务，及时把粮草安全、快速地转运到前线。1947年10月，他们从寺沟将100石粮食、100石饲料送往环县木钵；1949年6月，镇原县群众向固原县运送粮食195万余斤，面粉9.4万斤，饲料16.4万斤；同年8月，向平凉运送粮食45281石，饲料12159石，面粉800万斤，另给驻固原县解放军西北部队送米21600斤、面粉208万斤、饲料1200石……

抬担架、搞运输，征途一片繁忙

担架及运输是解放区人民一项有组织的、固定性的支前任务。镇原县干部群众组成的担架队和运输队，平时参加劳动或承担其他战勤任务，遇有战斗，部队打到哪里，担架队和运输队就紧跟到哪里，及时抢送伤员，运送弹药、粮食和军需物资。即使前方战事一度平静，后方运输线上也经常是一片繁忙景象。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镇原县组织5983人携带长短期担架704副随解放军出征，另有1404人协助；还为地方武装组织了担架308副；1947年，县组织进一步投入担架队员2000余人，运输队员543人；1948年，新增担架86副、运输队员2000余人；1949年6月，组织担架554副，3030人随军出征，西进宁夏、兰州等地，运输物资、抢救伤员，还协同部队参加战斗；当年9月，镇原县两次组织担架298副，支援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同时还抽调100名民兵，组成战勤服务队，随军修桥补路，破坏敌人碉堡工事、押送俘虏。担架队和运输队的领导职务，多由县、区、乡、村的主要负责干部的党员、积极分子担任。为解除支前民工的后顾之忧，镇原县委、县政府组织群众对支前民工家庭给予各种应有的照顾，使支前、生产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慰劳过境部队，掩护救助伤员

革命年代，镇原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子弟兵，而且凡遇到解放军过境，总是箪食壶浆，远接远送，体现了深厚的鱼水之情。此外，镇原县还发动群众在交通大道上每30里设一个供水点、粮草供应点，派专人负责过往解放军部队的饮食供应，确保过境子弟兵有喝、有吃、有住，牲口有草有料。

1946年8月，王震率三五九旅转战千里向陕甘宁边区转移，途经镇原县时，镇原县军民在有力打击牵制敌人、掩护三五九旅安全过境的同时，还筹集大批物资慰问过境部队，并为部队的食宿供给做了大量工作。8月29日，三五九旅500人进驻马渠，马渠群众在政府号召下，立即走出家门，为子弟兵洗补衣服、做热乎饭菜，让子弟兵感受“回家的温暖”。部队离开时，群众除提供补充供给外，还提供了如服装、粮草、医药等大批慰劳品。另一路部队到达屯字镇后，当地5个保的群众家家做饭、烧水，供战士使用。第二天部队开拔时，当地群众200多名青壮年主动帮助部队扛机枪、背行李，还有部分群众拉来毛驴、骡子为部队送伤病员、驮弹药，一直送到太平镇。后来部队领导特意给该区群众写信表示感激之情。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入，在部队、担架过往途经的要道之处，镇原县群众还增设数量不等的沿途兵站。兵站主要任务是接待伤病员转运后方治疗和收集粮草运往前线。此外，群众纷纷组织起来，不断修整、完善境内桥梁、道路，确保部队重型武器、军车的过往。

1948年，屯字镇战斗打响后，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奋勇迎敌。危急关头，镇原县群众和子弟兵休戚与共，冒着生命危险，自告奋勇为解放军做向导、抬担架、搞运输，并运走、抢救了数百名伤员。解放军突围转进后，当地群众依然千方百计救护、救护伤员，掩埋烈士遗体。就在解放军突围后的当天下午，群众不顾个人安危，隐蔽了解放军受伤战士100多人，晚间，将大部分战士秘密护送归队。部分重伤战士，被群众抬到家里藏匿起来养伤，偷偷请来医生治疗。敌人前来搜查，有人事先通风报信，群众就把战士们送进山洞里藏起来，白天偷偷送饭，晚上去人做伴，等敌人离开，晚上又把受伤战士背回家来。一段时间后，受伤战士基本痊愈，在群众的护送下陆续归队。1948年10月，陕甘宁苏维埃人民政府西北文艺工作第一团的苏一苹等以此为素材，编写了一个名为《孙大伯和他的儿子》的剧本，在解放区上演，引起强烈反响。

（作者单位：镇原县政协文史委）

刘少奇主持创建武汉工人纠察队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梅兴无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迁址武汉。受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从广州来到武汉，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

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伊始，刘少奇就着手组织武汉工人武装。他要求各工会都要建立工人纠察队。在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专门列出“对于工人纠察队决议案”一章，首次将组织工人纠察队正式写入文件，明确提出工人纠察队“应完全统一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有严密的、铁的纪律”“应该实行军队化管理，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训练”，主要任务是“为纠察工贼及防备反革命分子”。

同时，刘少奇千方百计帮助工人纠察队解决人员扩充、武器调配等问题，指示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要制订培育计划，举办纠察训练班，重点讲授军事技术课，使学员成为粗通军事的工运骨干。刘少奇等亲自给纠察训练班讲课，提高学员的政治、军事素养。

到1926年11月，武汉工人纠察总队发展到2000余人，总队下设两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分队下设若干支队。刘少奇协调10名共产党员学员从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提前毕业，分别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的分队长、支队长。

经刘少奇推荐，共产党员蒋先云、陈赓分别兼任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和工人纠察队队长。蒋、陈积极扩充人员和武器，并按军队要求对纠察队员进行训练。至1927年5月，工人纠察队发展到5000多人、3000多条枪。

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下，武汉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每逢关键时刻，工人纠察队冲锋在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4月底至5月初，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武汉工人纠察队担负起警卫任务，保障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5月17日，追随蒋介石的军阀夏斗寅乘武汉国民政府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率部叛变，企图乘机占领武汉。在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工人纠察队不仅担负起卫戍武汉、防止敌人破坏的任务，稳定了武汉三镇的局面，还配合叶挺所率国民革命军击破叛军的进犯。

刘少奇非常珍视这支党掌握的革命武装，“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后，他把大批工人纠察队基干连同较好的枪械，输送到叶挺、贺龙的部队里。1927年8月1日，转移到贺龙、叶挺部队的工人纠察队队员参加了南昌起义。

“小鬼班”英烈成就不朽抗日传奇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吴小龙

抗战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敌后作战，给予日伪以沉重打击。1944年，东江纵队第五大队的独立三中队，又称飞鹰队，活跃在淡水清溪平湖一带。7月21日晚，飞鹰队集中150名兵力，自东莞黄洞向平湖秘密进发，准备攻打驻守平湖的伪警中队。

7月22日凌晨4时，战斗打响。飞鹰队第一小队第一班（人称“小鬼班”）作为突击队，在班长黄友的带领下，干掉敌哨兵，在兄弟部队密切配合下向伪警察所发起猛攻。战斗中，黄友和战友用手榴弹压制住敌人，用小包炸药打开通路，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冲入敌营，仅用20多分钟便解决了战斗。此次战斗，全歼伪中队，打死日军顾问，俘敌40多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战斗中，“小鬼班”副班长李查理不幸中弹牺牲。

当日拂晓，飞鹰队押着俘虏向东莞凤岗官井头撤退，黄友带领“小鬼班”走在最前面，担任尖兵队，在行至老虎山脚沙岭村附近时，与日军400余人遭遇。敌人此时已经占据了有利高地，而飞鹰队却行进在一片开阔稻田地带，形势非常不利。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黄友指挥“小鬼班”抢占了稻田的一条较高的田基堤围，对日军展开阻击。

黄友率领“小鬼班”战士沉着应战，等敌人冲到步枪射程内时突然射击，打退了敌人的冲锋。随后的一个多小时，黄友等在阵地上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日军40余人，直至飞鹰队主力100多人安全撤出开阔地。战斗中，傅天聪、尹林、赖志强、李明等战士先后牺牲。日军发起新的冲锋，此时，黄友大腿被打断、身负重伤，仍和战友坚持战斗。他见一名新战士身受重伤，命令他撤退，自己留在阵地上掩护。子弹打完，他将随身携带的文件和驳壳枪埋入稻田淤泥里，奋力向敌人投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最后壮烈牺牲（黄友和“小鬼班”战士，牺牲时年龄均不满20岁）。

战后，飞鹰队返回战斗现场，找到了黄友等烈士的遗体，并找到黄友埋藏的手枪和《党员须知》，全体队员无不痛哭失声。

两个月后，飞鹰队在石马桥战斗中全歼日军守军，用胜利奠祭牺牲的战友。飞鹰队队长何通写了《老虎山下的英雄》一文，记述了黄友班的光辉事迹，东江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发出通报，授予黄友为“抗日英雄”的光荣称号，并把“小鬼班”定名为“黄友班”。中共中央追认黄友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战斗英雄”和“中国共产党模范党员”，延安《解放日报》对其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

江南支队先发制人破“清剿”

贾晓明

篇后拾遗 PIANHOUSHIYI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在战场上连遭败绩的蒋介石，苦于兵力不足，一面将驻广东等地的国民党部队陆续北调，一面派宋子文等人前往广东等地“稳定后方”。宋子文到广东后，立即着手补充由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并大肆组建地方保安团。1948年1月，宋子文命令国民党军广东各部对共产党人领导的广东人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清剿”。

1948年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广东各地区领导干部会议。会后，蓝造和王鲁明等回到广东东江南岸地区，在惠阳坪山召开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江南地委，统一领导广东江南地区的工作，同时决定将活跃在江南的各部队整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

江南支队建立后连战连捷，到1948年6月，不仅多次重创了敌人的“清剿”部队，队伍也发展到7200余人，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宋子文的第一期“清剿”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又准备对江南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他调集国民党正规军一五四师集结于广九铁路的东莞、宝安地段和大鹏湾沙鱼涌、大小梅沙一带，税警团进驻东莞地区，虎门守备总队集结于虎门、深圳一线，保八团、保十三团集结于惠州、坪山、淡水一带，企图先从东、西、北三面发动“扫荡”，将江南支队压缩于坪山地区，然后“一举聚歼”。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共江南地委和江南支队领导按照上级部署，决定乘敌人准备未周之机，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沙鱼涌之敌。

沙鱼涌位于大鹏湾北岸，距坪山约30里，南面临海，东西两侧石壁高山对峙，夹着一条小河。沙鱼涌在小河东侧，水陆都可通香港，集内有30多间商店，设有海关。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在沙鱼涌驻有一五四师十二团一营营部附一个步兵连、一个机炮排，另有敌人海关武装、税警部队共300余人。敌营部设在沙鱼涌北端的两层楼内，防守重点是南端的海关，另有2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欠1个排)分别驻于大鹏湾北畔的溪涌、大小梅沙、盐田一线。

针对敌情，江南支队作了如下部署：以第一团三个连、第二团独立中队和第三团一个连负责正面主攻，解决国民党军营部，然后突击敌人设在山上的炮排阵地，再攻海关；以第二团两个连在土洋村的西侧高地设伏，阻击可能由溪涌方向来援之敌；以一个排兵力，占领官湖村阵地，阻止敌人向东逃窜。

7月15日，江南支队1000余人按计划从坪山出发，于黄昏后秘密抵达沙鱼涌。16日拂晓前，各部进入预定展开的阵地。

凌晨4时，战斗打响。江南支队主攻部队第一团一个连和第二团独立中队沿途歼灭街道守敌，直扑国民党军营部，并派出部分兵力从侧后直插路口的碉堡。国民党军见势不妙，立即龟缩进碉堡，企图凭借火力负隅顽抗。第一团第一连和第二团独立中队很快攻下路口的碉堡，并肃清了周边之敌。

与此同时，第一团的另两个连冲向国民党军排哨阵地，经过30分钟的激烈战斗，歼灭敌军排哨，随后又分成两路，分别支援集内和海关的战斗。这时，第三团一个连也迫近海关。在和国民党守军进行的逐屋争夺战中，江南支队进攻部队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了数十名敌军缴械投降。很快，进攻部队夺取了海关东北侧高地的炮排阵地，并组织突击队攻打国民党军营部。突击队沿敌营部屋后的大树登上屋顶，掀开瓦面，向屋内投掷手榴弹，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担任正面攻击部队乘机冲入，在助攻分队的协助下，歼灭守敌。

江南支队各部相继取得胜利后，集中力量包围海关。海关内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枪投降。至此，历经3个多小时的战斗胜利结束。

据统计，此次战斗全歼守敌327人，缴获八二迫击炮2门、六〇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7挺，步枪、手枪180余支，子弹7万发，电台1部，军需物资一批。

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江南地区广大军民的斗志，也使江南支队的装备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打乱了国民党军“清剿”的部署。战斗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慌忙将驻守大鹏湾周围驻军全部撤走。

朱堂店新四军“网开一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刘 宏

1939年6月中旬，李先念、陈少敏在湖北省京山县养马畈召开会议，研究鄂中抗日武装的整编与扩大等问题，并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以陈少敏为书记的鄂中区党委，李先念、陶铸、杨学诚、夏宗武等为委员。会议还决定，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下辖3个团队和1个挺进队。其中，原信罗边游击大队和信阳挺进支队合编为游击支队第二团队。

1939年7月底，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队奉命挺进到河南省罗山县朱堂店一带驻防，准备补充给养后南下湖北抗日。8月上旬，第二团队发现了日军的运兵车队，立即投入战斗，给予敌人沉重打击。不久，日军派骑兵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又被二团队击退。二团队首长认为日军还会来朱堂店报复，于是立即召开各大队长、政工指导员会议，分析研究敌情，制定了作战方案：一大队和警卫队坚守朱堂店左翼阵地，正面抗击来敌；二大队坚守右翼阵地，同时派部队迂回到日寇后方，切断其退路；三大队以一个中队在左侧山岭阻击日军，以两个中队担任警戒，以防顽军从背后偷袭。

8月14日，日军出动400余人向朱堂店扑来。当敌人进入警戒线时，第二团队游击小组当即向敌人开枪射击。作战部队听到枪声，各自迅速进到指定作战位置。当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蜂拥般向二团队正面冲来时，一大队战士立即奋起还击，日军见势不妙，忙命令后撤，新四军乘胜追击，二大队按计划对敌人实施迂回包围，将日军团团包围在朱堂店北的枫树坡。

当地群众听说日军被新四军包围，纷纷赶到前线支援，让新四军指战员士气倍增。敌人多次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天黑后，二团队首长抓住敌人害怕夜战的弱点，决定采取“网开一面”战术，即故意放开一条出路，诱敌人突围逃跑，然后在途中对逃敌实施打击。敌人果然中计，顺着“缺口”仓皇向包围圈外逃跑，途中遭到二团队伏击部队再次重创，当场毙敌80余人，俘敌6人，缴获轻重机枪各1挺、战马4匹、步枪20支、子弹50箱以及其他军用品数百件。

战斗结束后，二团队还派出一大队袭击了信(阳)罗(山)公路边的五里店日伪据点，击毙伪皇协军团长以下数十人，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

朱堂店战斗开创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以劣势装备抗击装备精良的日军并克敌制胜的先例，极大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军威。